

# 孙中山 和他的助手

赵矢元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孙中山和他的助手

赵矢元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遇秀伟 龚江红  
封面设计：黄耀成

### 孙中山和他的助手

赵矢元 主编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 × 1168毫米 1/32 · 印张10<sup>14</sup>/16 · 字数 2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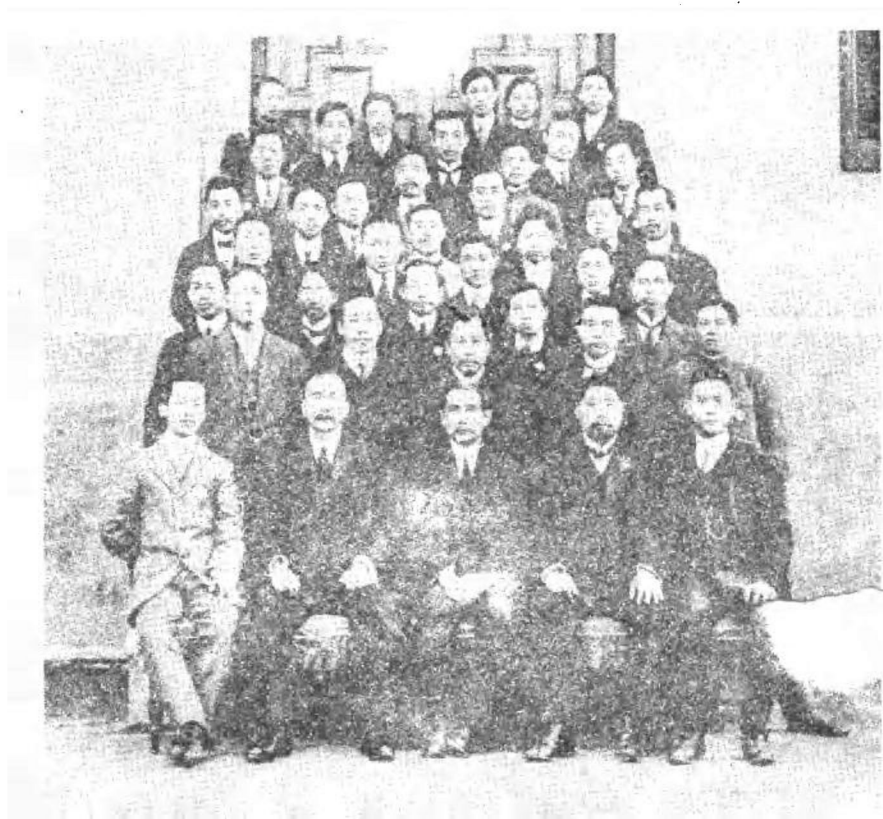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52

---

统一书号：11093·267 定价：3.00元

ISBN 7-207-00199-1 / K·17



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  
时期孙中山和他的同事、  
助手们

## 目 录

一、略说孙中山和他的助手（代序）	1
二、早期的革命助手	
“总理以吾弟称之者独此一人”	
——陈少白与孙中山	14
“为共和革命牺牲之第一人”	
——陆皓东与孙中山	24
“革命同志第一人”	
——郑士良与孙中山	32
附：“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史坚如烈士及其供词、绝笔考辨	45
三、“誓与孙逸仙共生死”	
——宫崎滔天与孙中山	65
横滨初会，推心置腹	65
艰难时期，鼎力相助	67
风雨同舟，生死相从	70
乐为媒介，联结志士	74
“祇教文章点点血，流作樱花一片红”	77
“困穷不滥，廉节可风”	80
“环翠楼中虬髯客，涌金门外岳飞魂”	82
志同道合，相互感召	84
深深的理解，永恒的怀念	89
四、“穷且益坚，百折不懈”	
——萱野长知与孙中山	92

首次会晤，倾倒拜服	93
“兄之热诚，弟我深信”	97
亲临战场，生死度外	101
同甘共苦，百折不挠	106
著书立说，缅怀“中山”	109
<b>五、安危须仗，甘苦共尝</b>	
——黄兴与孙中山	113
相识在东京，共建同盟会	113
屡仆屡起，愈挫愈奋	117
深明大义，顾全大局	123
辉煌的胜利，惨重的失败	127
不该发生的裂痕	132
<b>六、“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b>	
——宋教仁与孙中山	139
同盟会的悲欢离合	139
革命三策供选择	144
政治进取与埋头实业	148
竞选与被刺	153
<b>七、艰难奋进的领袖 忠实得力的助手</b>	
——胡汉民与孙中山	156
先生与学生	158
决策者与实干家	162
大总统与秘书长	166
为挽救共和而斗争	173
国民党改组中的“综合派”	176
历史的价值与历史的悲剧	183
<b>八、“薪之始燃也光焰万丈，转瞬之间即成灰烬”</b>	
——汪精卫与孙中山	185
同盟会里的小同乡	186



“学生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 .....	188
孙中山和他的南洋特使 .....	191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	194
功之首，罪之魁 .....	198
“一个很好的留声机” .....	205
“我死之后，敌人必定要软化你们” .....	210
<b>九、疾风知劲草</b>	
——朱执信与孙中山 .....	216
“以文章发挥真理兮，君实为国民之导师” .....	216
“誓以身殉我祖国兮，革命之役无不追随” .....	225
“艰难险阻，与君备尝” .....	229
<b>十、革命的“钱荷包”和“奥巴桑”</b>	
——廖仲恺夫妇与孙中山 .....	232
东京的追随者 .....	233
孙中山的“钱荷包” .....	235
孙中山学说的宣传家 .....	237
国民党改组的主要助手 .....	239
“哀思惟奋酬君志，报国何时尽此心” .....	242
<b>十一、是叛逆，也曾是当之无愧的战友</b>	
——戴季陶与孙中山 .....	246
留日同学会的会长 .....	246
第一次见到孙中山 .....	248
迎袁专使中的清醒者 .....	250
奉命办报，态度激进 .....	251
孙中山武力讨袁的坚决支持者 .....	253
宣传“北极下的新潮” .....	253
孙中山遗嘱的签字证人 .....	255
僭称复业，欺孙中山在天之灵 .....	256
<b>十二、“扶颠持危”，“成仁取义”</b>	

——陈其美与孙中山 .....	258
孙中山高度评价陈其美 .....	259
“光复以前,奔走革命” .....	262
“冒诸险难,卒创义于沪上” .....	265
“袁既毁宋,陈君首摘发其证据” .....	267
“陈君强毅不挠,与文等肩任艰难” .....	268
“山顶”与“半山”的比喻 .....	271
<b>十三、从长期的“心腹”“手足”到晚年分道而去</b>	
——居正与孙中山 .....	275
找孙中山去 .....	276
奔走星洲缅甸 .....	278
倡导中部起义 .....	280
武昌军政府的要角 .....	285
孙中山的“次长”与讨袁武将 .....	289
热心支持孙中山护法 .....	295
分道扬镳向右转 .....	298
<b>十四、“如身之臂,如驂之靳”</b>	
——蒋介石与孙中山 .....	302
“共历险艰,出入死生” .....	302
“如身之臂,如驂之靳” .....	310
并非“朝夕未尝离失” .....	320
<b>十五、“共进大同”的理想,终生不渝的情爱</b>	
——宋庆龄与孙中山 .....	324
孙中山密友的女儿 .....	324
事业与爱情 .....	328
“真正的伴侣和助手” .....	330
领袖与遗孀 .....	334
后记 .....	340



## 一、略说孙中山和他的助手（代序）

一位当代西方政治家说：领袖人物是一团热情的火，但如果没有助手，在他身后只能留下灰烬。他的话是很对的。

孙中山是一代革命领袖，他为中国革命奋斗三十年，经历了旧、新两个民主革命阶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三十年间，他屡遭挫折而坚持不懈的奋斗，建树了丰功伟绩，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既是伟大领袖人物的思想、意志、品格的结晶，也是各个时期助手们的拥护、合作、支持、赞助的结果。助手们为他的理想和事业，贡献了力量甚至生命，没有他们，孙中山取得光辉业绩是难以想象的。我们要克服只把眼睛盯住一个孤零零领袖的倾向，这也是以往我们研究孙中山等伟大革命领袖的一个严重缺点。

所谓领袖的助手，是众多追随者中的少数核心人物，即孙中山常说的“左右手”，“如身之臂，如骖之靳”，他们与主要领袖组成革命的领导群体。他们是努力实现领袖提出的时代奋斗目标和各阶段特定任务而起重要作用的那一批人。本书中只写了更有代表性者，还有一些应该写而未写进去。

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从孙中山与各时期助手的关系进行纵向考察，由初期的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到中期晚期的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朱执信、陈其美、居正、戴季陶、蒋介石、宋庆龄等，探讨各时期助手们的变化与中国民主革命发展变化的

进程。

(二) 从孙中山与助手们进行横向比较，看他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说明领袖与助手的作用不可互代，不可须臾离，探讨助手们对领袖的影响、贡献以及助手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三) 以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孙中山为主线，而又把笔墨着重落在助手们的身上，从助手这一面分析孙中山的重大影响和领袖地位的重要性，看他的贡献、品格、气质以及和他优点相联系的弱点、缺点。孙中山不愧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领导者，但又和一切伟大人物一样有其不足的一面，二者综合构成了这位值得永远缅怀的历史人物。孙中山不是超时的，他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什么“超时代的先驱”、“超时代的豪杰”、“超时代之政治家”。孙中山作为先驱、豪杰、政治家，只能属于他生活战斗的那个时代。

中国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开始的。“瓜分豆剖”、“庸奴误国”的紧迫形势，把不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提前推上了政治舞台。孙中山和康有为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同为救中国和改造中国，但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甲午战争时期，他建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第一次胎死腹中的武装起义。他依靠的是华侨中少数亲友出钱和会党绿林。孙中山说，那时“几乎是他一人之革命也”。由于时代限制，孙中山的“曲”不够高，“和”者甚寡，史坚如说理解孙中山革命主张“如骆驼穿针眼”，不过二三人。这时孙中山的助手只有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他们是好友、同学或同乡。史坚如还谈不到是孙中山的助手，这位“革命的天使”刚刚参加革命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原辅仁文社的杨衢云等人是孙中山的合作者，有他们的贡献，但不是孙中山的助手，因为杨衢云是兴中会的会长，他的年龄也比孙中山大十岁（三十九岁）。组织起义的实际领导者是孙中山，从清廷缉拿悬赏就

可以证明，孙一千两，杨一百两。张继曾指出，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的“中心人物”是陆皓东和郑士良，他们分别在两次起义后牺牲了。郑士良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为孙中山与会党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孙中山那时找不到其他可以依靠的力量，只能发动会党，认为他们是“民族老革命也”。

兴中会两次起义失败，失去两个主要助手，陈少白奉命在香港组织的《中国日报》，也没起多大作用，兴中会衰落了。孙中山在“艰难困苦，黑暗无视”的环境中奋斗，却成为世界闻名的“大革命家”。

孙中山闻名海内外，也得益于日本人宫崎滔天等人的帮助。据统计，孙中山的日本友人三百多，但真正起到助手作用的只有宫崎、萱野长知等极少数。尤其是宫崎与孙中山的思想相当接近，主张中日联合而又不单独以日本为“盟主”，他多方面帮助了孙中山，参与中国革命，撰写《三十三年之梦》，并为孙中山联络日本朝野，促进孙中山与留学日本的黄兴、宋教仁等合作，建立中国同盟会。他向宋教仁等一再推崇孙中山，说他“志趣清洁，心地光明”，是极难得的革命领袖。

同盟会是大革命家孙中山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结合，形成全国性革命分子的大联盟。二十世纪初，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他们中相当多的人由追求爱国之道而趋向革命，有十年革命奋斗历史的革命家孙中山首先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当然，双方都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有些留学生认为孙中山不过是绿林英雄或“汉高（祖）、明太（祖）”之辈，但很快认识到他是值得十分景仰的革命家；孙中山长期把会党视为唯一可靠的力量，在欧洲与中国留学生辩论“三昼夜”，才转向了觉醒着的知识分子，为此奔赴留学生最多的日本，主动寻找新的革命力量。

在日本，云集在孙中山周围的，已经是一批“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文武才技具有”的新志士。他们领时代之风骚，有着巨大的青春活力。这批被他赞为“英杰”的包括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夫妇等人。他们公认孙中山是革命领袖，因为他革命先行十年，已闻名世界，有世界眼光，博学多闻，有主义、纲领，有很大吸引力。

所谓同盟会是各革命组织的联合，实际主要是孙中山与黄兴为首的华兴会联合。孙、黄合作有重大意义，这是革命理想的倡导者和杰出的革命实践家、组织者恰到好处的结合。黄兴承认并推举孙中山为领袖，孙中山尊重这位有威望的副手。黄兴带来一大批两湖以及长江一带青年革命分子，成立同盟会的重要工作是两湖人完成的，他们在同盟会内任要职。《民报》是宋教仁与湖北的居正等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的。

原兴中会成员，除孙中山为总理外，同盟会干部中只有职务并不重要的冯自由，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的不过十人。这时广东，尤其是广州府的革命化知识分子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夫妇、古应芬等补充了孙中山的力量。在那时，家乡地域观念很强，广府派革命青年中一些人，成为孙中山最得力、最亲密的助手。吴稚晖说过：“学生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说明了领袖与助手的关系。一九〇六年萍醴浏起义失败被捕的权道涵供词中也说，孙中山的“心腹之人”只是广东人。

张继说：孙中山在同盟会时的“中心人物”是黄兴。谭人凤说孙中山最信任、依靠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和黄兴。他们和孙中山形成同盟会的核心力量和领导群体，推动了革命运动迅速迈向高潮。

孙中山在《民报》著述不多，《发刊词》是孙口授，胡汉民执笔的，胡还写了有名的《民报六大主义》，发挥了孙中山的政

治主张。《民报》作者中，胡汉民、汪精卫等广府革命分子最能领会、并较为准确地阐发孙中山的思想。胡、汪著述甚多，而且和章太炎宣传国粹主义、带有佛气的文章不同，和张继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也不同。孙中山一九一二年评价胡汉民有“大力量，大才干”，“有学问，有道德”。胡汉民说，汪精卫虽少创见，但善于领会和发挥，他的口笔宣传才能十分惊人，胡为之惊倒，也强烈吸引了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其中包括华侨少女陈璧君。

一九〇七年孙中山和胡汉民、汪精卫、黄兴等，即谭人凤说的孙“最信任之人”南下开展革命。胡是帷幄左右的重要人物，汪赴南洋宣传与筹款获得很大成功，黄则亲自领导多次武装起义，同盟会的影响扩大了。

多次起义失败，又先后发生两次倒孙风潮，但黄、胡、汪等都是孙中山的坚决支持者。河口之役失败后，汪精卫确实产生“悲观”情绪，但悲观并不消极，他为打击清廷、唤醒沉睡者和回击诬蔑攻击孙中山的谣言，而决心北上从事暗杀活动。这也是一种革命自觉的行动，事虽不成，影响重大。汪在狱中表现也是好的。

孙中山赴美筹款，国内革命的领导工作委托胡汉民、黄兴。胡是同盟会南方支部负责人，实际取代已涣散了的东京总部；黄兴建立统筹部，继续发动武装起义。一九一〇年广州新军之役再次失败，同盟会主要干部普遍灰心丧气，失去信心。孙中山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他在庇能召开干部会议，分析形势，鼓动士气，决定新的斗争，这才有震动全国的“三·二九”黄花岗之役。

在华侨中孙中山也有他的助手，如邓泽如等人无数次为他募款，筹集革命经费，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孙、黄发动多次南方沿海沿边起义失败后，宋教仁、居正、谭人凤、陈其美等转而策动长江流域武装起义，在上海成立中部

同盟会。这不能说是分裂，而是对孙中山战略的补充和纠正。正是由于成立中部同盟会，武昌首义与各地响应才取得成功。孙中山远在海外，却是国内革命的旗帜，临时总统非孙莫属，这和他本人的威望、影响以及助手们的支持、作用都密不可分的。

孙中山回国出任临时大总统，黄兴实际是南京临时政府不设总理的总理，军政责任集于一身；胡汉民为秘书长，被称“第二总统”，代孙做了大量工作；宋教仁任法制局长，制定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法令。汪精卫出狱后，取得南方革命党人的赞同，在北京从事联袁倒清工作和南北议和活动。胡汉民在自传中说，他与汪对造成辛亥革命的结局，可说“功之首”，“罪之魁”，任后人评说。

孙中山任临时总统时，南北和谈“几成定局”，他在答复谭人凤的电文中说：“清帝退位，民国统一，（袁）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后来他还说，当时若不“放弃责任”，怕是“假共和”也难以取得。辛亥革命的结局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是力量对比的结果，历史的必然，也受到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

解除临时总统后的孙中山，对新建立的民国“以小康期之”，放弃政治，积极从事实业建设，到处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宋教仁等多数党员认为不切实际，所以“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成立民元国民党，宋教仁是中心人物。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下降了，其重要助手胡汉民只得到一个候补参议，连理事都不是。孙中山勉强承担了国民党理事长，诸事由宋教仁代理。孙不抓党，不问政治，埋头实业，不如宋在政治上进取，他所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想通过议会政治、责任内阁，把袁世凯置于虽尊荣而无权的总统位置上。大选，国民党取得很大胜利，孙中山也很高兴，他说：“国民党者，革命党之化身也”，也发表过肯定两党政治等言论。

这和不久之后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

他身边的重要助手，实际上都离他而去。宋教仁忙于国民党改组、议会政治；汪精卫参与发起“进德会”，自鸣清高，连官都不作；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远在广东；戴季陶革命得很，天天骂袁世凯；黄兴解散留守府，要搞矿业，任粤汉铁路督办，也一事无成。革命的领导核心已不存在，孙中山实际上放弃了领袖的作用，助手们也各行其是，放弃助手的作用。其结果，首先是宋教仁被刺，接着发生很快就失败了所谓“二次革命”。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在黄兴寓所开会，坚决支持他武力讨袁的只有戴季陶。三个多月之后，在袁世凯武力压迫下，李烈钧首先在湖口起义，黄兴被迫到南京就任讨袁总司令，战事受挫，又“贸然一走”。汪精卫只是通电请袁辞职。革命党人已消失了辛亥时的勇气和魄力，涣散瓦解了。

这批民国的元勋，在手创的民国已无立足之地。他们逃亡日本，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黄兴认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提出重组革命力量三项办法。孙中山则说：此次惨败“全在不听我之号召”，要建新党，“要为真党魁”。他提出中华革命党必须服从他个人，“服从我，即服从革命”；国家要民主，党内不能有民主等等。于是，孙中山与黄兴等由分歧而分道扬镳了。

中华革命党的领导格局和助手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孙中山确立了真正总理一长制，这和同盟会时期“同志集议”的总理是大不相同的，并影响到后来中国国民党。往日重要助手黄兴及其代表的实力派远离他了。汪精卫偕夫人去了欧洲，后来又听夫人的话返回新加坡，根本没有和孙中山见面。陈其美说他“小德出入”，就指这件事。胡汉民、廖仲恺等继续支持孙中山反袁，但曾有某种保留。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前近一年间，入党总人数



六百九十二人，其中东京有五百余人，而胡、廖入党号是四百多号。黄兴也指出过胡汉民态度与孙中山略有不同。朱执信则坚决反对中华革命党的建党办法，与孙中山多次激烈辩论，仍拒绝参加，自己回到广东发动反袁斗争。为此孙中山竟不准南洋华侨为朱募款，直到一九一五年底，朱在同志劝说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也向他道了歉。总之，广府派助手在中华革命党中的作用，远不如同盟会时期那么重要。

这时孙中山的主要助手是陈其美和居正等人。湖北的居正、田桐等在“二次革命”前就反对统治湖北的黎元洪，多次密谋起义都遭到失败，他们是支持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的一支力量；另一部分，也是主要的，即陈其美、张静江、戴季陶（都是湖州人）等江浙派填补了得力助手的真空，并带来江浙一批追随者，如陈其美的盟弟和部属蒋介石等人。陈其美和居正不仅是中华革命党的部长，而且是孙中山一南一北的两员反袁司令长官，各自负责一省。孙中山极力筹款，全力支持他们，陈其美发动多次“小暴动”，居正攻占山东几个县城，但成就不大。

陈其美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逃亡日本后坚持反袁的斗争，更深刻地认识了孙中山，坚决支持他组建中华革命党，并就任首席部长。他对胡汉民说：“我不是盲从”，孙先生站得高，他“在山顶，我们只在山腰”。陈其美的认识与行动是一致的，他为孙中山的反袁事业贡献了一切，包括生命。一九一六年陈其美被刺身亡，孙中山极为哀痛，说陈是“我党唯一柱石”，力争为之国葬，国葬不成，实际进行了“党葬”。陈其美怎么能是“反共老手”呢？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重要助手，是善始善终的革命家。没有陈其美、居正等助手，孙中山在反袁斗争中不可能导演出许多壮烈的场面。

袁世凯死后，民国恢复了，但这个民国仍然不属孙中山的。

他承认，主观上为革命而建立中华革命党，但办法不对，“没有成功”。

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先后凋谢了，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仍是胡汉民等广府人，他们对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时确立的党内总理一长制也“习惯了”。一九一七年开始的广东护法运动更加强了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的重要性，更加深了领袖与助手的密切关系。被孙中山赞为“革命之圣人”的朱执信，一九二〇年牺牲。孙中山期待陈炯明这个老同盟会员能成为“民元前之黄兴，民二后之陈其美”，对陈炯明的粤军予以全力扶持。但是，第二次护法时，孙中山与军阀化了的陈炯明发生了尖锐矛盾，陈炯明没成为黄兴、陈其美，他叛变了，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陈炯明叛变，沉重打击了孙中山和他的事业，促使孤立无援的孙中山走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

他为蒋介石的《广州蒙难记》写了序言，“以志吾过”，自我批评道：“予乏知人之鉴，不及预寝逆谋”。

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开始时，孙中山的主要助手间是有分歧的，廖仲恺态度坚决，胡汉民认为可以有条件的同意，汪精卫怕“孙悟空钻进肚子里”加以反对。但很快孙中山说服了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和维护。胡、汪在国民党“一大”前后的表现基本上是好的，能按照孙中山的意见办事。“一大”中发生多起激烈复杂的斗争，他们以善于“调和”，起了某种积极作用。从冯自由对胡、汪的指控也可以证明。冯自由顽固地反对联共，孙中山十分气愤地说：“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民生主义，就是反对革命，要开除、枪毙！”冯自由请宋庆龄转交他给孙中山的信中表示了对胡、汪、廖的极端不满，认为他们“以身跨两党之故，仍首鼠两端，多方为共产党袒护”，要求孙中山“引咎道歉”，严惩“引狼入室”的胡汉民等人。从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的